

# 巨流河的回声

□ 迺存磊

齐邦媛的《巨流河》，以作者的话说，“是我从内心深处写给世界的一封恳切的长信，至此心愿已了，留下祝愿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齐教授了却心愿，获得宁静的心绪，而此书入读者之眼，却搅起千万人的心中波澜，有太多的回响。《洄澜：相逢巨流河》一书，即为这回响的汇集了，其间有评论、访谈、来函等，既是回音壁的意思，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互文的微妙关系。

《巨流河》引起的“洄澜”，有来自台湾，也有来自大陆，若两相比较，会极有意味。

台湾的评论，如陈文茜说，“齐邦媛女士‘巨流成河’与过往20世纪50年代巨著型回忆录最大的差异，在于她谈的不尽是一段远离故乡的回忆，她来台湾时够年轻也够老，记录那个混乱大迁徙年代的点点滴滴。这些历史，在近代台湾史的撰述中，完全被忽略”，落脚点在近代台湾史。单德兴的《台湾文学的国际推手》，林博文的《齐家父女的台湾经验》，自题目看即一目了然。而张作锦的《齐邦媛的书孙运璿的车》谈台湾的铁路电气化，封翁的《邮车真好》谈邮政服务，更是极为专门化了。

大陆的评论，如黄艾禾说，“齐先生的文学修养与个人品性，让她把这种国家大背

景下的个人史写得如此平和，如此典雅，又如此缠绵——特别是那份典雅，在我们这边已经失却却多年了。齐邦媛或许是想告诉台湾的读者：我们的生命之根与文化之源都在大陆，那是源远流长的一条长河；而我们身在大陆的读者，却从中读出，她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其实也是我们的历史”，落脚点在一“条长河”。而卢跃刚读到齐邦媛留在内地的同学鲁巧珍珍留之际的倾诉，“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不仅潸然。

在访谈中，侧重点也是有所不同。如台湾《中国时报》所做访问的附记乃《铁汉挺民主

康宁祥谢师恩》与《外销台湾文学“译”马当先推动》，而作家简媃写的访问记是从生活细微之处，所想所感等入手，得到一个更为私人化的齐邦媛。大陆的媒体采访，问出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未见台湾媒体的关注，而“大陆开始炼钢铁，台湾开始有留学生去美国，台湾那段时间出了许多科学家，受教育，维持基本的伦理。那时我还跟别人说，我们的小孩没有变坏。（后来我们的小孩也‘现代化’了）”，这样的比较，更为显豁地现出分别。齐邦媛还谈起朱光潜先生，“在乐山我们曾很近距离地看他，

看了好几年，知道他原来是什么样，不能想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那种变化是很伤心的。后来我看到他出的几本书，只是在序或者后记里写一点，可是我觉得够了，我已经知道他受了相当多的侮辱，一再地解释或者否定自己那种侮辱应是他最难过的事”。这样的话语更是有感而发了。

齐邦媛曾对电话那端的记者说：“台湾的年轻人都喜欢那些热热闹闹的书，不知道大陆怎样。”闻此言，我们也不由得暗自说声惭愧，因为情形并不乐观。不过，巨流河仍然在流淌，《巨流河》仍有人在阅读，总是好的。



《洄澜：相逢巨流河》  
齐邦媛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很多事情是来不及说的

□ 范典

《斯人已远》这本书是通过周立波的长孙女周仰之之手，以家族采访的形式，将1930年至1970年间的国民生活展现在读者眼前。她此前创作的《我的祖父周立波：人间事都付与流风》写到很多关于周立波的生前往事，包括创作《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作品的前后经历，而在《斯人已远》中则统摄了周家人、徐家人及辐射周边人员，形成了一幅众生相的画卷。

书中对周立波和周扬二人志同道合的友谊花了不少笔墨，讲到周立波之前的名字为周绍仪，因被周扬的革命热情感染，从湖南益阳前往上海，一方面通过自学英语翻译外国文学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也积极投身于革命工作。

两人患难之交至少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当周立波找不到工作时，周扬努力介绍翻译工作给他，两人合力完成一些译作，可见还未正式走上革命道路时，两人的情谊还是建立于共同的文艺情结；另一方面，当周立波参加“飞行集会”被捕后，周扬花费各种努力去托人释放周立波，看尽不少人脸色，最终花大价钱才将他保释出来，这也是二人革命情谊得以加固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作者身为周立波的长孙女，她有必要谈到周立波和家人的关系，他的婚姻，以及处于他原来婚姻关系上的人物，那就是她的祖母姚芷青。姚芷青勤奋能干，人缘

极好，虽然文化并不高，但有一颗处事能力极强的心，还曾当过地方上的法官。芷青对于一些离婚案或家庭矛盾的案子亦有自己的一套断案原则，虽说与当今极严苛的法律制度有一定抵触，凭着女性独有的慈爱和怜悯特性去判断一场纠纷，本身是有问题的，但能够以此作为契机使坏事变好，使冷冰冰的制度变为一场人性而体贴的化解，实际上也是为当时并不完善的法制锦上添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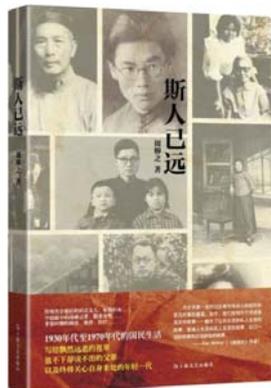
芷青的这种人缘体现于她对自己婚姻失败的认命，体现于她没有沉沦于既定命运的悲哀漩涡，而是一如既往教子育人，以一份女性的大爱去包容所有人，也以此去感化身边人。作者从自己祖母身上看到这些，对祖父周立波的意见思迁其实也有一点怨言，这从其拒绝参加祖父葬礼的事情中可以看出，她在情感上对祖母的处事和立场更为附和。而芷青的这种原配命运，在民国时期尤其普遍，很多从封建制度阴影下走出来的文人政客，在大时代、文明化进程中充当着家族牺牲品，不惟他们如此，他们的另一半忍受着包办婚姻遗留的罪果，无论在身体还是内心，都封闭于其间紧紧自缚不得开解。这是社会动荡、人心变迁造成的一种后果，追求进步以牺牲落后思想作为沉重代价。作者作为女性，尤其是去国20余年的现代女性，她眼中的祖母形象虽然有一点晦暗，却

依然形成了一个时代进程中无法避免的符号，个中滋味，颇为复杂。

诚如作者所言，“在人人都谈论股票投资、高科技等话题的硅谷重镇，书写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斯人斯事，还真的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若不是有文字内容的记述，单纯让你看这些过去的旧相片，谁还有兴趣停留在过去？

难能可贵的是，像作者这种私人化的历史写作，因为通过口述记录，有很多国民生活的印迹，就像陈存仁的一些作品，让人在其创作目的之下，潜移默化中接收到当时的市井文化。此书也是，可以看到当时上海街头小巷国民的生活情态。

很多事是来不及说的，记录才是最保险的方式。



《斯人已远》  
周仰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中国阅读生活存在两种相反趋向

仔细考察当今中国的阅读生活，会发现存在两种极端相反的趋势。

一种趋向，是追求严肃阅读，倡导回归经典性和思想性的阅读，强调阅读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艰难却值得为之努力的精神成长，阅读是通往心智成熟的有效方式。这在十多年来中国报刊、网络中大量出现的书评版面、空间，以及年度好书评选（甚至年度失望之书也是其表现形式），以及所涌现的书评人群体和大量存在于学校、民间的各种类型读书会中都有体现。

阅读既是汲取新知，砥砺情操，同时也是形成横向的知识共同体，是一种抱团取暖的相互慰藉。比如这些年相继出现的有关前东欧、苏联和纳粹时期的德国的历史书籍，就是一种引人注目的阅读文化现象，包括《第三帝国的语言》、《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弯曲的脊梁》、《耳语者》、《天鹅绒监狱》、《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布达佩斯往事》等，都属这一系列。这些以严肃和深刻为特点的作品，折射出对20世纪世界政治文化与精神世界的反思。

另外一种趋向，则是伴随各种新媒体空间的崛起（包括各种论坛、博客、微博、人人网、微信等），中国人的阅读发生巨大却未必深刻的转向。越来越多的阅读指向了对信息的追赶与抓取，这也正是这个所谓大数据时代强调“信息抓取能力”的体现。

以新媒体为平台的阅读，往往更追求即时而显著的效果，就像注射肾上腺激素一样需要立竿见影的结果。而日常生活世界的高度浓缩化和快节奏化，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的爆棚式增长，以及娱乐生活的极度多样化，都导致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弥漫着一种“系统性的焦虑”，而依赖于网络资讯与文本的“悦读”就承载了排解焦虑感和无聊感的心灵功能。

## 电子化形式对严肃阅读有“敌意”

互联网阅读与传统文本阅读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往往对严肃阅读具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其实这种状况其来有自，自晚清经典逐渐淡出读书人的生活世界，慢慢地就是一些短平快的畅销书、小册子或者一些口号式的政治读物在抓取青年人的心灵。只是到了这个“阅读是平的”网络阅读时代，在传统中国所形成的经史子集等严肃的等级化（指精神趣味等）秩序荡然无存，每个人都变成自我决断阅读趣味的个体。

经常有学生对我说，每每在手机上读书或文章，都被一种潜在的焦虑所强迫，总是忍不住地“触摸”与“滑动”，对阅读效率的追求压制了思想、趣味与美感的形成（自然这在商家那里就成了一种“食指经济”）。面对稍微严肃的内容，总是觉得有一点抵触甚至厌烦。

在手机阅读中，阅读成了一种追求显示度的“文化竞赛”，展示谁能够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转发资讯和文章，以及转发的数量与品质，其实质是被一种炫耀性和攀比心所左右。阅读本是让人回归一种自然的灵性与深度的潜沉，可这里的带有强烈消费主义性质的阅读，却似乎在将阅读者推向其追求目标的反面。

## 严肃阅读是一种有抵抗感的阅读

严肃阅读绝不仅是私人偏好，也关乎一个民族共同体公共生活的构建，历史记忆的形塑和心灵生命的滋养。对于严肃阅读的抵制和消解，往往就是在导向一种温吞吞、懒洋洋的公共文化。这种文化依赖于个人的低幼化、短平快式的阅读和不假思索的“稳定”，后者所构建的往往是私人领域消费主义与公共领域犬儒主义的内在结合。

何为严肃阅读？“严肃”首先指阅读选取文本是严肃而真诚的，不恶搞，也不戏说，更不是商业利益的精致计算下对受众心灵的拿捏。同时，“严肃”也指阅读方式的极为严肃，是寻找一种有抵抗感的阅读（对阅读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某种挑战甚至颠覆）。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经典，在中国曾热极一时，但很多人以“资治通鉴之心”阅读此书，将其从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抽取出来，抽象地谈论改革与变迁的可能性及其社会影响，这无疑是对严肃作品的矮化和极度简化。如果认真阅读托克维尔研究专家崇明教授的《创造自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就会发现这才是真正的严肃阅读，将托克维尔的思想放回历史语境来阐释其在自由理念（贵族或精英）与民主（平等）观念之间的巨大张力和解决之道。

非严肃的阅读自然也有愉悦感，可这是一种类似于口腹之欲的暂时性愉悦，来去皆匆匆。而需要严肃思考的阅读，尽管艰辛、漫长，却可能带来一种长久的智性上的欢愉。比如，王汎森、赵园、杨国强、卜正民、孔飞力等关心明清知识分子的学者著作，显然是必须严肃对待的，这些一流学者作品所带来的“洞见”与“史识”远非时下流行读物所可比拟。

也许会有读者质疑：曾经的阅读构成了相对稳定的“三观”，让我从零开始用严肃方式阅读严肃作品，还要追求严肃的目标，这并非追求幸福，而是拥抱痛苦，甚至会摧毁“三观”，导致人生变成一地鸡毛。这其实又返回究竟为何阅读之题。阅读的首要目标究竟是追寻当下的快感，还是丰富对历史与世界的整体认知，并进一步滋养自我心灵、锤炼思维能力？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 有抵抗感的阅读才是严肃阅读

【阅读现象】

□ 唐小兵

方式要由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决定？这难道不是另一个意义上的「趣味专制主义」吗？  
中，对青年一代大学生的阅读状况表达了某些忧虑时，便遭受了个别网民和读者愤怒的「反击」：凭什么我们的阅读清单和个人的偏好与习惯所决定，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足够的正当理由来进行臧否或指责。因此，当我在与旅美学者徐贵教授的对谈在一个所谓多元化和平等的时代，阅读变成完全个人化的私事，包括其阅读的文本、阅读的方式乃至阅读的目标，都是由